



符号与传媒  
Semiotics & Media

前二十年新诗论争触及的问题，  
在百年新诗史上不断重复上演。  
本书以符号学诗歌理论为出发视界，  
融合新诗论争的原初视界，  
探寻新诗发展的历史动力，  
即新诗的形式力量。

# 形式动力： 新诗论争的符号学考辨

Dynamics of Form: A Semiotic Study  
of the Debates on Modern Chinese Poetry

乔琦 著

中国符号学丛书

丛书主编 唐小林

赵毅衡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国符号学丛书 ○ 丛书主编 唐小林 赵毅衡



符号与传媒  
Semiotics & Media

前三十年新诗论争触及的问题，

在百年新诗史上不断重复上演。

本书以符号学诗歌理论为出发视界，

融合新诗论争的原初视界，

探寻新诗发展的历史动力，

即新诗的形式力量。

# 形式动力： 新诗论争的符号学考辨

Dynamics of Form: A Semiotic Study  
of the Debates on Modern Chinese Poetry

乔琦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冰  
责任校对:宋 颖  
封面设计:米迦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式动力:新诗论争的符号学考辨 / 乔琦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6  
(中国符号学丛书 / 唐小林, 赵毅衡主编)  
ISBN 978-7-5614-8670-2

I. ①形… II. ①乔… III. ①新诗—符号学—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2234 号

书名 形式动力:新诗论争的符号学考辨  
XINSHI DONGLI: XINSHI LUNZHENG DE FUHAOXUE KAUBIAN

---

著	者	乔 琦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8670-2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	品	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0
字	数	189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cn>

# 目 录

导 论	( 1 )
第一章 早期新诗“诗体演变”与诗性探寻	( 10 )
第一节 被打开的双轴：从《尝试集》到《女神》	( 12 )
第二节 诗性：以《蕙的风》论争为中心	( 23 )
第二章 新诗的标出性	( 34 )
第一节 “丑的字句”讨论与新诗语言的宽窄幅迭变	( 34 )
第二节 从标出性看新诗走向	( 43 )
第三节 诗歌刺点：意义在文本断裂处产生	( 56 )
第三章 新诗“内容—形式”之歧解	( 71 )
第一节 核心语及其展开	( 72 )
第二节 40年代新诗的“内容—形式”之争	( 85 )
第三节 《被围者》的形式结构分析	( 97 )
第四章 阐释之“度”与新诗的阅读困惑：以刘西渭、卞之琳等的讨论为例	( 103 )
第一节 由“诗歌符号学”引起的批评	( 103 )
第二节 “诠释与过度诠释”之辩	( 105 )
第三节 “圆宝盒”的衍义：刘西渭与卞之琳的一段阐释公案	( 108 )
第四节 《圆宝盒》的诗歌符号学解读	( 113 )
第五章 新诗“晦涩诗学”	( 116 )
第一节 不在之在与断裂的弥合：从“不通”说起	( 116 )
第二节 元语言冲突与晦涩诗学	( 128 )
结语：形式演化使新诗达到的新境界	( 140 )
主要参考资料	( 147 )
后 记	( 155 )

## 导 论

中国新诗论争的基本形态和由此延伸开的诗学问题，构成一显一隐两条线索，显现的论述表层似乎是一连串的“主义”之兴替，而隐在的动力则是诗人们对新诗发展不倦的形式探索。本书以 1917—1949 年的中国新诗论争为研究对象，首先有必要交代三个问题：

### 第一，“新诗”的命名。

“新诗”“现代汉诗”“现代诗”“白话诗”等名称，均指向一个共同的对象，但它们在表述上的差异，包蕴着使用者不同的策略和意图，或者说不同命名的使用能够被解释出不同的意图。“新诗”是否暗含划分新旧等级的话语霸权？以“现代”代替“新”是否更贴近一种文类的本质？诸如此类的问题裹挟着诗歌元语言与现代化进程的交锋与纠缠，元语言层的混乱决定了对命名进行解说的复杂。文类的命名有待历史检视，远非笔者之力所能决定，本书沿用“新诗”一词，只是借用诗歌史的一种描述方式，并无褒贬之义。放弃对表层命名做价值判断，并不代表没有立场；相反，笔者将试着描绘一条相对清晰的诗体演变线索，并试着回答“何谓新诗”这一最基本的新诗之问。

### 第二，时间段的选取。

为什么选择中国新诗史上的前三十年做考察对象？为什么是三十年而不是更长的时段？

现代文学三十年，对中国新诗的言说颇为丰富，其形成和呈现方式比较复杂，除逻辑严密的论述之外，还有大量印象式评说、通信交流、对话等。理论上的探索和刚刚诞生又充满争议的新诗相伴而生，因而几乎每一种观念的提出，都引发了不同观点之间的论争。基于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和现代诗歌独有的发生语境，在借鉴先前经验和接受各种影响的同时，新诗理论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已然具有部分自身独立的内在品质。

有意思的是，论争中触及的许多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又一再以新的方式被提出，中国诗歌至今仍然难以摆脱这些问题的纠葛。当代诗歌史上，朦胧诗的“朦胧”，第三代诗的口语化、反抒情，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诗歌中的叙事

性因素，新世纪新诗标准的再讨论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现代诗学论争中相关问题的延续。

圈定前三十年新诗论争，既取决于文学史所提供的丰富而有价值的论争材料，又因为当代新诗理论探索和研究依然在不断重复过去的问题。

第三，何以借用符号学理论研究中国新诗论争？

回顾三十年诗学论争，并不是要用某种“比较高明的外国理论”来解决中国诗歌起步时遇到的一些问题，而是相反：新诗史上这些争论问题，很多实际上已经触及诗歌的本质，如果能对它们取得比较清晰的认识，就可以帮助理解中国新诗发展的形式动力。这个动力一直存在，只是我们不理解。

目前有的研究只停留在史实描述层面，缺乏对新诗理论中独特概念的挖掘、思考和阐发；有的论说局限在诗学论争本身，似乎研究者只是为了继续加入历史上的某一场论争，而未能从当下的语境出发去理解前人已取得的成就；更多的研究者很难从诗歌模仿现实观念中超脱出来，以现实世界的逻辑审视诗歌的艺术世界，对诗歌进行道德评判，倒置元语言性和诗性等。以上所列几种常见的研究视角都不足以回答中国新诗史提出的问题，很多研究都没能触及诗歌理论的本质，没能信服地告诉我们，这些争论的出现是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新诗史上注定会出现这些问题。探索仍在进行中，因此笔者试着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探讨这些似乎已经被说过多次的问题。雅柯布森、里法泰尔、卡勒等学者的符号学诗歌理论，有助于从形式论角度发掘中国新诗原本就存在的对诗性、文本品质、阐释等多方面问题的探索。新诗相关论争反复出现而不得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对形式因素的忽视。

本研究的任务，是从我们的语境、文化能力出发，去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前辈会如此准确地抓住推动新诗发展的基本动力，即新诗的形式力量；理解为什么他们能敏锐地完成如此艰难的任务，把新诗的演变写成一部比较成功的历史。要理解前人，就需要“视界融合”：从我们的视野出发，去弄明白前人如何能把新诗变成现在这样一种艺术。诗歌研究的符号学，不是我们用来衡量前人的尺度，而是我们用来理解前人成就的工具。本研究绝不是把符号学套用到前人的论述上，符号学只是给我们自己提供一种理解历史的方式。

## 一、形式因素：诗体演变的历史动力

自胡适的《谈新诗》始，康白情、俞平伯、郭沫若、宗白华、朱自清、茅盾等都讨论过新诗的标准问题，一直延续到 21 世纪初，各种观点依然很难达成共识。21 世纪对此问题的关注，有其独特背景，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新诗的

边缘化和冷风景，“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论争，伦理和美学关系的讨论等，促使人们不得不思索：什么样的诗歌是好的诗歌？怎样的写作才有价值？“新诗标准”讨论伴随着许多敏感问题：什么样的标准？谁的标准？甚至，该不该有一个标准？问题本身充满了问题，但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能讨论，反过来，诗歌研究还真无法绕过这些问题。

新诗存在命名混乱的问题，“白话诗”“新诗”“现代汉诗”“现代诗歌”“现代新诗”等名称都曾经出现或正在使用，名称混乱的背后隐藏着许多问题，白话与诗，新与旧，现代与传统，新与现代等等纠缠不清。有学者指出：“‘新诗’这一概念的含混及其意识形态上的迷思，实际上转移了诗人和诗歌批评对诗的本体问题的关注。”<sup>①</sup>的确，“新诗”概念一直是含混游移的，这显然影响到诗歌批评的展开，但如何使“新诗”概念清晰化呢？如果只是以一种称谓代替另一种称谓，能够解决问题吗？恐怕问题得反过来思考，被称为“新诗”的这样一种诗歌，它的实质是什么？

21世纪以来，《诗刊》（2002年），《江汉大学学报》（2004年）、《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等期刊，均集中发文讨论新诗标准。新诗可以有客观的标准吗？这是讨论无法绕过的问題，“新诗的历史却证明，在‘标准’的问题上保持一定的神秘感，似乎是更为可取的态度，因为任何标准的‘确立’，即使在一定的时空内，赢得了认同，但在根本上，都具有某种‘权宜’性质”<sup>②</sup>。实际上，“标准”确实很难得到认同，有些文章个人化到令人难以卒读的情状，而且“标准”的说法本身过于宽泛，因此参与讨论者往往执着于自己感兴趣的一个方面，导致讨论各方并无交集。

有论者讲道：“在事实层面关于什么是新诗或者新诗的标准，在目前的现代汉语写作中，能够确定的大概只有分行排列的文学创作这样的—个基本标准……虽然这个形式主义的标准，其巨大的宽容性看起来有些像一个笑话，但除此以外，确实找不到一个更具效用意义的新诗标准。”<sup>③</sup>判定新诗的标准，筛选来筛选去竟只剩下分行排列这一最直观的印象，究其原因，或与新诗论说多偏向内容相关。对形式的探索又集中于新诗写作技巧，而形式论方面的思考太少。

①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8页。王光明在对新诗的反思中，提出一种新的命名方式——“现代汉诗”，强调从语言和形式入手，建构汉语诗歌的发展。

② 姜涛：《“标准”的争议与新诗内涵的歧义》，《江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③ 王毅：《新诗标准：谁在说话？》，《江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给新诗冠以“标准”的说法不甚妥当，笔者认为标准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新诗认同危机的体现，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新诗何以为诗？如果以“诗性”代替“标准”来探讨新诗的诗性何在，或许更方便和有效一些。新世纪的新诗标准讨论，是对始终含糊不清的新诗概念的回溯，是对新诗元命题的关注。不谈标准，但要论诗性。新诗“诗性”的种种困惑，源自对诗体历史演变动力的误读。

古典诗歌如何变成新诗？初期白话诗如何变成真正的新诗？

王国维《人间词话》曰：“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一种诗体取代另一种诗体的关键之处在于，旧的诗体“自成习套”，僵化固定的模式约束了意义的表达。那么，引起诗体变化的第一要素是意义、思想还是形式？是新思想需要新形式，还是新形式才能容纳新思想？似乎很难给出一个答案，又或者孰先孰后并没有引发应有的思考。在革命和现代化的元语言压力下，新思想、新精神、承载新思想的白话，有意无意地被视为新诗诗体确立的本质方面。

若从思想和精神方面确认新诗，那么晚清诗界革命中，呼喊“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黄遵宪所作诗歌已足够新。但实际上，黄遵宪诗歌完全未脱离古诗词形式，不能算作新诗。旧形式容纳新内容的诗不是新诗，这个认识比较统一，可是，一进入新诗具体问题的讨论，各种内容决定论的说法依然肆意蔓延。

白话是新诗的又一层迷障。初期白话诗的尝试者如胡适、沈尹默、康白情、俞平伯、刘半农等的诗作，留下鲜明的从旧体诗到新诗的过渡痕迹，他们的诗作为什么解放得不彻底？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是白话使用得不够彻底。单纯从语言入手，并不能抓住要害，新诗不完全排斥文言字词，语言本身不是问题，语言的组合与选择倒可以归入新诗的双轴操作之中。

简要地说，诗体演变的历史动因，不取决于语言，也不取决于内容和精神，而主要在其形式因素：从旧体诗到新诗，组合轴上的操作突破了整齐的诗行，聚合轴上的操作则保证了文本的张力，新诗的诗性恰恰活跃于组合、聚合之间。从胡适、沈尹默到俞平伯、康白情，再到郭沫若，在双轴不断被打开的过程中，新诗诗体逐渐确立下来。诗体演变问题将在第一章做详细论述，此处的粗线条勾勒，用意在于凸显整本书的逻辑起点。



## 二、视界融合：从符号学诗歌理论回顾中国新诗论争

“视界融合”，本是伽达默尔在描述理解现象时提出的术语，即理解者的现在视界与对象本文包含的既有视界的融合，融合的结果，在于理解者和理解对象最终都超越了各自原有的视界，从而达到了新的视界。伽达默尔从尼采和胡塞尔的哲学概念里借用了“视界”这个概念，意在强调艺术品总是有着比其作者指出的意义更多的东西，因为人类的生活总在运动中，视界就是移动的。视界融合的实现，在于我们理解本文时必定要超越本文的原初视界，要把本文同传统呈现的问题融合起来。

仅就诗歌本文来说，其原初的历史视界是由诗人与同时代读者规定的，但历史视界不能限制诗作的存在，因为诗作也为后来的读者所理解。因此，诗作的视界也是开放性的，它向不同时代的读者敞开，读者可以在诗作中发现它的新视界。总之，在伽达默尔看来，“历史视域的筹划活动只是理解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且不会使自己凝固成为某种过去意识的自我异化，而是被自己现在的理解视域所替代。在理解过程中产生一种真正的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这种视域融合随着历史视域的筹划而同时消除了这视域”<sup>①</sup>。

符号学和新诗论争的视界融合，有助于理解和发现新诗探索者们如何从形式上推动新诗的历史，从而解决中国新诗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本书涉及的主要新诗论争如表 1 所示：

表 1

论争内容	论争集中时间	论争主要参与者
《尝试集》论争	1920 年至 1922 年	胡适、胡先骕、胡怀琛、朱执信等
《文学旬刊》与《诗学研究号》的论争	1921 年至 1922 年	斯提（叶圣陶）、吴文祺、王警涛、郎损（茅盾）、梅光迪、薛鸿猷、谬凤林等
《蕙的风》论争	1922 年	胡梦华、章洪熙、于守璐、周作人、风声（鲁迅）、宗白华等
“丑的字句”论争	1922 年至 1923 年	梁实秋、周作人、俞平伯、柏生、东峦、虚生、西谛（郑振铎）等

<sup>①</sup>（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94 页。

续表1

论争内容	论争集中时间	论争主要参与者
《现代》、《独立评论》刊物上的晦涩论争	1932年至1937年	吴霆锐、崔多、施蛰存、絮如(梁实秋)、沈从文、周作人等
《圆宝盒》讨论	1936年	卞之琳、刘西渭(李健吾)
“内容—形式”之争	30年代末至40年代	亦门(阿垅)、林宏、劳辛、初棣、袁可嘉、唐湜、李广田等
《新诗潮》与《中国新诗》的晦涩论争	1948年	张羽、舒波、蒋天佐、袁可嘉等

什么是诗?由中国新诗的元命题引发的论争经久不息,草创期论争的焦点之一在白话诗的“白话”上,在论争参与者们设想的新诗和旧体诗对立的格局里,“白话”的问题异常尖锐,这实际上是语言的焦虑。从旧体诗到新诗,已经烂熟到僵化的各种诗体不再适用,主要原因倒不在许多论者说的内容的变迁,而在于汉语音节的变长导致五言、七言等整齐的诗行被打破,形式不得不变。长短不一的诗行和张力结构成为新诗形式变化中的主导问题。汪静之诗集《蕙的风》的出版,引发了一场围绕“道德”展开的论争,对诗歌内容的过度指责,实际上早已溢出了诗性的范畴。

白话入诗的问题解决之后,初期白话诗的语言困惑呈现于“丑的字句”论争之中,俞平伯、梁实秋、周作人等的讨论,远远超出“美丑”之限,体现了语言选择轴的宽窄幅变化以及现代文化对新诗语言择取的压力变迁。和寻常语言相比,诗歌语言具有明显的标出性。20世纪20年代初对俞平伯《冬夜》和康白情《草儿》的集中评论,就已显示出新诗语言研究的自觉,而标出性的变化,也揭示出新诗的发展走向。

“内容—形式”之争,乃新诗发展面临的又一大问题。从穆木天提出诗的统一性和持续性,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新诗派诗人对新诗形式探索的坚持,中国新诗的“内容—形式”问题不断引发各种争论。穆木天、邵洵美、路易士、刘西渭等人结合具体诗作的分析,触及文本的深层结构,在袁可嘉、唐湜、李广田等人的深入讨论之前留下了一条研究线索。袁可嘉的“现实,象征,玄学”及诗篇的“间接性”等观念,突破了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语境元语言压力,坚持对诗之意义结构的探索。

刘西渭和卞之琳就《鱼目集》中的一些诗作的反复讨论,为新诗解诗学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个案,在读者和作者的碰撞中,呈现出无限衍义的几个精彩环节,同时也揭示了文本意义探寻中的阅读与阐释困惑。

晦涩论争涉及面广而且深，非常值得关注，相关研究也较多，但最难说透彻。这个问题涉及元语言：一方面，诗歌自携元语言，解释自身所包含的矛盾、悖论；另一方面，元语言冲突清晰地展示出解诗中“晦涩”感形成的原因。

如上，从“何为新诗”开始，到“晦涩论争”作结，新诗史上的历次论争恰好和诗歌符号学理论达成视界融合，原初视界和新视界的融合，对于诗性、文本品质、阐释等各环节问题的理解都有所推进。

### 三、论述的主体框架：诗性—文本品质—阅读阐释

本书以发生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几次重大论争为对象，以符号学诗歌理论为出发“视界”，在“诗性—文本品质—阅读阐释”的框架里，融合新诗论争的原初“视界”，希冀能够更好地理解反复纠缠于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的诸问题，并尝试探索中国新诗的符号学解诗理论或方法。本书主体部分由五章构成：

导论旨在说明形式因素构成诗体演变的历史动因。符号学诗歌理论，从形式论的角度丰富和展拓了诗歌研究的视野，而形式论问题正是中国新诗研究较为缺失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缺失，近一百年中国新诗所面临的“内容—形式”“晦涩”“散文化”等问题反复缠绕、论争不休，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第一章重回新诗源头，讨论新旧之变以及新诗诗体艰难探索的老问题，挖掘藏匿于现代化进程中，又被形形色色社会历史批评所淹没的新诗的最根本问题——何为诗性。

早期新诗论争未能说清新诗的诗体演变过程。胡适的“诗体大解放”打破格律形式的壁垒，为新诗组合轴的操作提供了空间，但胡适的新诗创作却留有太多的古诗词痕迹，《尝试集》中大部分诗篇未能达到诗行长短的自由组合。康白情的诗歌虽达到长短句的组合要求，但选择轴太小，诗行几乎没有张力。直到郭沫若，新诗才真正实现组合轴和聚合轴的完全打开，《女神》既有自由的形式，又具备耐人琢磨的张力结构。

面对《蕙的风》，以及各类被冠以或误读为代言角色的新诗和新诗集，我们都应当试着超越那些指称功能、元语言功能，毕竟诗性才是诗歌最主要的功能。

第二章结合“丑的字句”论争和《冬夜》《草儿》评论，讨论新诗标出项的不同倾向与中国新诗流变之间的互动关系。

“丑的字句”的讨论，在本质上体现的是新诗语言聚合轴上聚合段的宽窄幅变化问题。《冬夜》《草儿》诗集中大部分诗歌语言既没能找到新的表意系统

里诗性的实现方式，又缺少和日常语言应有的区分度。新诗总体趋势上的标出不足和接收者对标出认识不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元语言性对诗性的挤压。

在元语言性与诗性的对抗中，标出确保了诗之为诗的要求。标出到一定程度，可能在文本中产生刺点。刺点是文化“正常性”的断裂，是日常状态的破坏，刺点文本没有稳定统一的结构，没有准确固定的意义，却在文本断裂处暗藏有待发掘的深意。

第三章以对新诗“内容—形式”之歧解的分析为中心，彰显意义之形式与形式之意义构成的文本深层结构的重要性。

阿垅“内容—形式”之论有两大缺陷：重元语言功能，轻诗性；重社会语境，轻文本结构，简单化乃至排斥诗歌的艺术形式。《诗创造》的分化源自艺术性和社会性的对抗。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主张，超越内容和形式的分裂，把“感觉的波动”和“客观事物的精神”打成一片，把“诗人对处理对象”的各种感情融入文字和修辞而不外露。具体到文本意义的生成方式和结构，袁可嘉结合现代诗歌，对诗篇的间接性做了深入探索。

迂回表意乃诗歌符号的首要和本质特点，在主型和主型的实现模式之间，在核心语和其展开序列之间，在文本的各种扩展和转化之间，意义以暗示、迂回、间接的方式，蔓延其间。

第四章讨论阐释之“度”与新诗的阅读困惑。

1936年刘西渭和卞之琳就《鱼目集》中相关诗篇进行了多次交流。其中《圆宝盒》一诗争议最大，不同的解读，构成符号释义活动中无限衍义的几个环节，即便作者本人也无法终止衍义过程。“圆宝盒”衍义过程，最大的缺陷在于卞之琳和刘西渭的阐释过程都隐去了从具象到抽象的路径，使阐释本身成为封闭的自我行为；最具启示意义的则是刘西渭倡导的基本阐释立场——诗人挡不住读者；另外，衍义过程还留下一个疑问：个体体验是读者（意义接收者）最后的法宝吗？

理论上，阐释之“度”可以被完全剔除，符号（文本）意义，开放且不确定；诗歌文本的反语法、反模仿、断裂、跳跃等“超规定性”特点，都决定着阐释难以得出确定的结论。无度之阐释的合理性论证起来困难重重，从卡勒对里法泰尔批评，到卡勒与艾柯的辩论，再到刘西渭与卞之琳的讨论，共同呈现了符号衍义的开放性，也一并展示了设立界限的必要性。只要我们注意文本与读者的辩证关系，避免走向文本强迫读者的歧途；只要我们清楚，诗歌符号学的每一次阐释实践，获得的也只是部分文本意义，那么，里法泰尔提供的诗歌阐释理论，对于中国新诗阐释将大有裨益。

第五章从元语言冲突的角度，以新诗史上历次“晦涩论争”为对象，探索晦涩的诗学意义。

中西方文论和批评对晦涩问题多有关注，但问题本身太过晦涩，尚有不少有待厘清和重构的空间。诗歌符号的表意特点和文本的复杂结构形式，决定了“不通”的必然存在。“不通”带来的是读者的不懂，但元语言的释义压力保证了任何文本必能读出意义。

晦涩问题纠缠于新诗发展的百年历程，读者能力元语言与文本自携元语言的冲突，社会语境元语言与文本自携元语言的冲突，形成两种常见但较低层次的晦涩；同一层次元语言冲突形成的阐释漩涡投射于诗歌中，带来的意义晦涩，才是更高层次也是真正诗学意义上的晦涩。

结语，重审诗性在诗歌研究中的主导地位。诗性的基本点在于符号自指。符号和对象的分裂使得诗歌和现实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我们无法用现实约束每一行诗，但整体的诗歌却在跳过现实之后，对现实做出更深刻的理解、诠释和重写。新诗的标出性，新诗的“不通”，新诗晦涩诗学的理想状态——阐释漩涡的出现等，共同搭建起诗性世界。

新诗阐释的符号学尝试，贯穿于本书的每一章节，总结起来符号学诗歌阅读至少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用力：第一，跨越模仿的藩篱，不必一定要求诗歌抒写具有现实的指称对象，相反，诗歌往往跨过对象直指解释项；第二，打破文本平滑的整体结构观念，断裂处有时暗藏解开意义之谜的玄机；第三，不孤立文本意图，留心各种互文性织成的意义网络等。

## 第一章 早期新诗“诗体演变”与诗性探寻

从1917年2月《新青年》二卷六号发表胡适《白话诗八首》算起，中国新诗诞生已将近百年。一个百年，在文学演变的长河中，的确还算太短；若从新诗内部来看，一百年又似乎应该有着非同寻常的变化。然而，百年新诗甚至还未来得及确立诗体，就被裹挟于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其诗性，也始终难逃被遮蔽和被置换的命运。

梁启超将诗界革命和普遍意义上的革命等同视之：“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sup>①</sup> 革命中最激烈的碰触在精神方面，因而诗界革命更看重“新意境”而不是“新名词”、新风格。

胡适《誓诗》篇云：“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sup>②</sup> 胡适创造新文学的豪气起于新世界提供的新材料。

闻一多对新诗之新的引证首推郭沫若，“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sup>③</sup>。时代精神被明确指称为郭沫若新诗的关键品质。

梁启超、胡适、闻一多的论述，标示出从晚清诗界革命到五四新诗运动的一种共同倾向——对“精神”的格外倚重。这个结论既显而易见又充满挑战，因为胡适当年倡导“诗体的大解放”提出的从“八事”入手，实际上有六条在

<sup>①</sup> 梁启超：《诗话》，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1页。

<sup>②</sup> 胡适：《沁园春·誓诗》，载《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9月第2版，“附录去国集”第50页。

<sup>③</sup>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载《闻一多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讲“内容”或“精神”；或许有人会问，“诗体的大解放”难道不是彻底的形式革命吗？笔者只能说，初期新诗生长于一个充满悖论的环境之中，既有理论上的似是而非，又有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的严重脱节，更有围绕新诗能否成立而展开的论争中，双方各执一端而又皆以“内容”为重。

因此，迫于社会语境元语言压力，以“内容”或“精神”为依据确立新诗诗体，成为早期新诗讨论进入的第一大误区。

白话能否入诗是新诗草创期最引人瞩目的问题，在胡适等人那里，白话工具论是难以动摇的观念，白话与诗的巨大鸿沟无法填平，甚至较少有人意识到其间的距离。比较而言，俞平伯的“时时感到用现今白话做诗的苦痛”体验更加耐人寻味，他指出：“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他是赤裸裸的，没有固定的形式的，前边没有模范的，但是又不能胡诌的；如果当真随意乱来，还成个什么东西呢！所以白话诗的难处，不在白话上面，是在诗上面；我们要紧记，做白话的诗，不是专说白话。”<sup>①</sup> 所以，视“语言”为本体，以“白话”为圭臬，乃新诗诗体确立过程中的第二大误区。

全然不顾诗体演变中的承继关系，彻底否定古典诗歌艺术，甚至将“旧诗”视为“骸骨”<sup>②</sup>，为第三大误区。

上述三大误区将在下文有所侧重地分别展开论说，因为今天的新诗研究并未能完全避开这些缺陷，尤其是对诗歌内容或精神的过分偏重。从古典诗歌到新诗，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根本上带来诗体演变的是哪些因素？早期新诗在混乱中又暗含着怎样的秩序？这些问题均有待重新考量。

面对处于新旧结合点上的初期新诗，我们必须清楚“转换和变化不仅要根据历史上的演变来陈述（首先有 A，然后 A<sub>1</sub> 出现并代替了 A），而且那种转换也是一种直接经历的共时现象，一种相应的艺术价值”，读者需对两种秩序具有清晰认识，“一种是传统的标准，一种是作为背离传统标准的艺术新奇之物”<sup>③</sup>。新诗凝聚着传统和新生的部分，在纵横坐标上展开的诗体演变纷繁复

① 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载《俞平伯诗全编》，孙玉蓉、乐齐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603页。

② 1921年10月26日，旧派文人发起一次文学活动，东南大学和南京高师日刊出版一期《诗学研究号》。对此，《文学旬刊》接连发表数篇文章予以回应，其中斯提（叶圣陶）的《骸骨之迷恋》，称旧诗是骸骨，用死文字，他在文章结尾呼吁“‘生也有涯’，精神须耗于相当之地，不要迷恋骸骨罢。”此后，围绕旧诗/新诗引发一场激烈论争。《骸骨之迷恋》一文，见《文学旬刊》，第19号（1921年11月2日）。

③（俄）罗曼·雅各布森：《主导》，载《符号学文学论文集》，赵毅衡编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杂，而形式论研究对文学艺术系统演变的关注，尤以雅柯布森的“主导”观念最为出色，或能帮助理解初期新诗诗体探索的脉络。

本章重回新诗源头，讨论新旧之变以及新诗诗体艰难探索的老问题，试图挖掘藏匿于现代化进程中，又被形形色色社会历史批评所淹没的新诗的最根本问题——何谓诗性。

## 第一节 被打开的双轴：从《尝试集》到《女神》

《尝试集》与《女神》，在不同的叙述中，代表着对于初期新诗发生的不同判断。从出版时间上说，《尝试集》占得先机，而《女神》略晚一年半。1920年3月，新诗史上第一部个人诗集，胡适的《尝试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时值新旧文学论争异常激烈之际，诗集一出，即引发各方争论。而与之相反的是，1921年8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则伴随着各种推崇备至的呼声。1922年7月，郁达夫在“《女神》生日纪念会”前夕，格外指出：“有一件事情，我想谁也应该承认的，就是‘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的一段功绩。”<sup>①</sup>对《女神》的评价中，类似的观点很多，那么《女神》是否对《尝试集》“第一”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呢？

把新诗的发生提前到晚清诗界革命，抑或将新诗后推至《女神》的出版，又或者坚守《尝试集》的开创性地位，各种新诗史叙述莫衷一是。时至今日，精确选择哪一种答案并不重要，要紧的是，对新诗起点之不同认知所隐含的问题和思路。

任何表意活动都在符号双轴上展开，即组合轴和聚合轴构成符号文本的两个基本向度。雅柯布森对双轴功能做了界定，组合轴为“结合轴”，其操作围绕接近性关系展开，聚合轴为“选择轴”，其操作围绕相似性关系展开。以诗歌为例：四言、五言、七言以及其他长短句的句式为组合，而字词之间、诗行之间乃至诗节之间的张力，则取决于聚合轴上的选择。双轴关系中，组合显而聚合隐，因此组合轴操作的结果更容易引起注意。从旧体诗到新诗的变化中，使用白话，打破诗行固定的字数，被更多地关注，并自然而然地被当作支撑新诗诗体的主要因素。至于新诗文本间的各种张力——深隐一层的结构形式，则成为早期新诗讨论中较少涉及的部分。

<sup>①</sup> 郁达夫：《〈女神〉之生日》，载《郁达夫全集》，第5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



笔者试图结合早期诗学论争和新诗创作，重绘新诗探索轨迹，并试着使诗体演变中新诗之不同于古典诗歌的决定性因素得以凸显。

## 一、《尝试集》论争

胡怀琛和胡先骕先后从整体上对《尝试集》进行批评。尽管胡怀琛多次强调，批评是为着诗的前途，无关文言和白话、旧体和新体的问题，其诗歌批评却始终未曾进入新诗的逻辑世界。从为胡适改诗到明确宣称“我的批评，是标明旗帜，反对胡适之一派的诗”<sup>①</sup>，胡怀琛早已选定传统诗学的立场。因而，出现如下评断也就不足为怪了：“《尝试集》的第一编，大多数是完全好的，第二编便不对了，据他自序说，是听了钱玄同先生的话，叫他如此做的。新诗能成，便是靠着第一编里的几首诗，新诗不能成立，也是坏在第二编里的几首诗。”<sup>②</sup>采用“新诗”的称谓，却以五言、七言痕迹鲜明的“第一编”里的诗作为支撑，胡怀琛制造的悖论值得深思，细究之下，这一悖论又或具有某种普遍性。

对于胡适和胡怀琛就《尝试集》音节方面的争论，朱执信曾专门撰文参与讨论，一方面批驳胡怀琛不懂音节，另一方面认为胡适对音节高下的解释太过抽象。朱执信提出音节的使用应当与诗歌的意思相契合，即“声随意转”。音节和意义，构成朱执信的新诗观：“我们要求用很浅的字眼，很少的字数，表出很深很复杂的情绪。所以看了好懂的，都是很难做的。这难做的原因，音节要占大部分，易懂的缘故，还有一部分在音节。”<sup>③</sup>浅与深对照间，朱执信意欲突出深刻复杂的情绪意义，而音节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意义的实现。按照这一思路，意义被圈定在音节的限制中，所谓“声随意转”，自然而然转化为“意由声定”。事实上，无论“声”“意”关系如何，只靠“音节和意义”还远无法确立新诗，朱执信的分析仍未能划出新诗与旧诗的界限。

对《尝试集》批评更尖锐、影响更大的文章，当数胡先骕的两万余字长文《评〈尝试集〉》，该文刊载于1922年出版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学衡》上。胡先骕在翻检《尝试集》诸诗篇之后，得出断语：“无论以古今中外何种之眼光观之，其形式精神，皆无可取。即欲曲为胡君解说，亦不得不认为‘不啻已死之

① 胡怀琛：《〈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版，序，第2页。

② 胡怀琛：《〈尝试集〉批评》，载《〈尝试集〉批评与讨论》，前引书，第12页。

③ 朱执信：《诗的音节》，载《朱执信集》（下），上海：民智书局，1925年版，第470页。